

颂圣文化与士大夫精神的交织呈现

——北宋牡丹诗的文化观照

路成文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基于北宋牡丹审美玩赏活动的新特点,与唐五代牡丹诗相比,北宋牡丹诗的创作情况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基于颂圣心理而创作的牡丹诗大规模涌现,使作为题咏对象的牡丹被赋予深厚的政治意涵。与此同时,基于士大夫文人个体化情感、经历或精神的牡丹诗词,在继承中晚唐文人牡丹诗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北宋牡丹诗;颂圣文化;士大夫精神;文化观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8)01-0081-11

中国古代牡丹审美玩赏风习,最盛于北宋。以洛阳为中心的牡丹审美玩赏活动,在帝王后妃、朝廷大臣、一般士大夫文人以及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下,体现出大众化、经常性和制度化等特点。在洛阳等地,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推动的“万花会”连年举行;在朝中,以皇帝为中心,众朝臣随侍举行的“赏花钓鱼宴”,前后持续近百年。为使帝王后妃在牡丹花季能够欣赏到姚黄魏紫等名贵品种,西京留守每年差人驿送牡丹至开封,谓之“贡花”。此举更是延续至徽宗朝,甚至演变为“花石纲”之类劳民伤财的恶政。牡丹与政治的联姻,因而成为北宋牡丹审美玩赏活动的突出特点。与此同时,士大夫文人对于牡丹的关注,也达到了空前地步。文坛领袖欧阳修任洛阳留守推官时,受洛阳爱花风俗熏染,检阅书史、实地考察,撰写了著名的《洛阳牡丹记》,并以“洛阳花下客”自谓,留下了不少题咏牡丹的作品;著名理学家邵雍中晚年定居洛阳,在观照牡丹的同时,喋喋不休地题咏牡丹,藉以观物阐理明道,表达对宇宙、历史、世事、人生的理解与体悟。除此之外,几乎所有著名文人都曾有过栽植、游赏牡丹的经历,留下了近五百首题咏牡丹的诗篇。基于上述情形,北宋牡丹诗在主题取向及文化精神方面,体现出颂圣文化与士大夫精神交织呈现的时代特点。

一、北宋时期基于颂圣心理而创作的牡丹诗

牡丹审美活动与政治文化的联姻,是北宋牡丹

文化的新特点。由此形成的若干制度,或与此相关的若干政治事件,为牡丹审美玩赏与歌咏创造了更多的契机。北宋牡丹诗词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作品。它们可以看作是李白应制咏牡丹在宋代的嗣响,但其规模和声势则远远超过了李白及唐代为数不多的同类创作。

首先,持续近百年的北宋宫廷赏花钓鱼宴,衍生了—批副产品——赏花钓鱼诗。

北宋宫廷赏花钓鱼宴在太祖时就已略具雏形,至太宗、真宗朝形成定制,仁宗朝趋于极盛。这项宫廷礼仪制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赋诗。比如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雍熙元年,984)至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几乎每年暮春,都要在宫廷后苑举行赏花钓鱼宴,每次活动必令从臣赋诗,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带头赋诗,从臣唱和。仁宗嘉祐六年(1061)又举行过规模盛大的赏花钓鱼宴。^①

在诸次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活动中,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的一次活动影响最大。这次活动由宋仁宗首倡,从臣皆和。据《全宋诗》统计,当时宰臣以下韩琦、欧阳修、司马光、宋庠、宋祁、祖无择、陈襄、刘敞、苏颂、王安石、郑獬、沈遘、徐积等数十人各唱和创作一至二首。宋祁更有状云:

臣伏见今月二十五日,召宰臣以下赴后苑赏花钓鱼。侧闻降赐天什,许群臣属和。荣幸之极,二纪罕逢。臣滥直北门,于法当从。而偶以

移疾,适在告中,不得侍欢秘幄,与百兽参舞。怅恨三陌,飞肉无阶。谨率芜累,次歌奉和圣制诗一章。局情浅致,无以称道盛德万分之一,干渎呈览。(《全宋诗》第2514页)

赏花钓鱼诗的创作,甚至成为有机会参与赏花钓鱼宴的士大夫文人的必修课,许多人为应付场面往往“宿构”(即提前写好诗,以备不时之需),偶遇皇帝临时改换诗题则狼狈不堪。比如《宋会要辑稿·礼·赏花钓鱼宴》载:

《麟台故事》:天圣八年二月,上幸后苑赏花,宴辅臣、宗室、从官,及三馆京官以上亦预。先是,得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永兴,寘于清辉殿。是日,命从臣观之,应制赋诗,上亲第其能否。集贤校理王琪诗最蒙称善,寻下褒诏,而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诗最恶,乃夺职为司封员外郎、通判冀州。范蜀公《东斋遗事》:赏花、钓鱼赋诗,往往宿制。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因命赋山水石歌,出于不意,多荒恶者。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纸笔若吟咏状。一人忽仆于石上,曰:“数日来作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撩倒。”^②

提前宿构,临时换题,因而导致应制作诗时文不对题,狼狈不堪,自属可笑。有的诗人甚至拟作数十首赏花钓鱼诗,以备不时之需。如《全宋诗》即收有彭汝砺《拟赏花钓鱼诗》十首。

北宋宫廷赏花钓鱼诗,以颂圣为主,艺术性比较一般,且大多亡佚,否则,按照《宋会要辑稿》等史料的记载来推测,恐怕不下数千首。

其次,基于颂圣心理,宋真宗、仁宗时期的宰辅大臣们创作了不少以歌功颂德、歌咏太平为主题的牡丹诗词。比如夏竦《宣赐翠芳亭双头并蒂牡丹仍令赋诗》云:

华景当凝煦,芳丛忽效奇。红房争并萼,绀叶竞联枝。彩凤比飞稳,霞冠对舞欹。游蜂时共翥,零露或交垂。胜赏回金辂,清香透黼帷。两宫昭瑞德,天意岂难知。(《全宋诗》第1789页)

此诗作于宋仁宗天圣年间,其时仁宗尚幼,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权处分军国事”。二圣并立而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在此情势下,最高统治者利用一些祥瑞之事,强调这种政治局面的合理合法性。这首诗通过题咏“双头牡丹”,歌颂“两宫昭德”之瑞,无疑顺应了当时的政治局面。除此之外,夏竦《延福宫双头牡丹》《五月同州奏牡丹一枝开三花》

等诗,宋庠《玉宸殿并三枝牡丹歌》《安福展千叶双头并枝白牡丹歌》《清辉殿双头牡丹》《瑶津亭同窠双头牡丹》,宋祁《千叶牡丹》《应诏内苑牡丹三首》等诗,以及夏竦《景灵宫双头牡丹赋》、宋祁《上苑牡丹赋》等,都是在仁宗前期特定政治形势下开展的带有强烈颂圣意味的作品。

第三,通过对牡丹或牡丹玩赏活动的描述来歌颂太平。这类作品数量也非常多。

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交驰翠幃新罗绮,迎献芳樽细管弦。人道洛阳为乐国,醉归恍若梦钧天。(文彦博《游花市示之珍(慕容)》,《全宋诗》第3534页)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洛人惊夸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赀。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擅价各一时。当时绝品可数者,魏红窈窕姚黄妃。寿安细叶开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传闻千叶昔未有,只从左魏名初驰。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最好潜溪绯。……(欧阳修《洛阳牡丹图》,《全宋诗》第3599页)

一春颜色与花王,况在庄严北道场。美艳且推三辅冠,嘉名谁较两京强。已攒仙府霞为叶,更夺熏炉麝作香。会得轻寒天意绪,故延芳景助飞觞。(韩琦《赏北禅牡丹》,《全宋诗》第4055页)

牡丹尊贵出群芳,销得宸游奉玉觞。侍宴佳人相与语,姚黄争及御袍黄。(张公庠《宫词》四首其一,《全宋诗》第6257页)

公从帝所享钧天,归及三春景物妍。洛鲤烹鲜随玉饌,姚黄开晚待琼筵。身同五福居周分,心似南风助舜弦。花木只堪供暂赏,直须嵩少伴长年。(范纯仁《和文潞公归洛赏花》,《全宋诗》第7444页)

宋人牡丹玩赏之盛况,在许多宋人笔记小说中都有记载。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帘幄,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公宅,至花落乃罢。”牡丹玩赏活动(特别是洛阳)在宋人(特别是南渡以后)眼中正是繁华盛世的重要表征。邵伯温《邵

氏闻见录》云:“洛阳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开,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囿,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上引数诗或直接涉及到洛阳牡丹花市(文彦博诗),或对洛阳牡丹之盛进行描述(欧阳修诗),或对日常生活中的牡丹玩赏活动加以表现(范纯仁、韩琦、张公庠),大都蕴含着一种兴奋与惬意,这种心理情感集中体现在强至的《题姚氏三头牡丹》中:

姚黄容易雒阳观,吾土姚花洗眼看。一抹胭脂匀作艳,千窠蜀锦合成团。春风应笑香心乱,晓日那伤片影单。好为太平图绝瑞,却愁难下彩毫端。

强至(1022-1076),字几圣,杭州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尝受知于韩琦,颇得时誉。这首诗题咏姚氏三头牡丹,从诗的第二句推测,似乎所咏为杭州姚姓人家所种的牡丹奇品。诗的前两句以姚氏三头牡丹与洛阳牡丹中的花王“姚黄”相提并论,大有此姚花亦甚奇特之慨。次二句写牡丹颜色之鲜丽,以及群花齐放时之盛丽。“春风”二句略寓人生感慨,至结尾两句,又对此姚氏三头牡丹之奇品大加赞赏,“好为太平图绝瑞,却愁难下彩笔端”两句,表达了作者目睹奇花的兴奋与激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视此牡丹奇为祥瑞之迹的联想,进而表达欲形诸笔墨而无其才力的感叹。其实,强至不仅已经表达了他本人赏玩此三头牡丹时的激动情绪,更将富有时代色彩的题咏牡丹以颂圣的心态集中表达了出来,即诗人们在玩赏牡丹时,感受到国势之强盛,视美艳富丽的牡丹为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从而产生了用诗歌、绘画等形式来描绘牡丹、歌颂太平的强烈冲动。牡丹之所以成为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与北宋士大夫文人赏玩牡丹时的这种颂圣心理有很大关系。

二、基于士大夫文人个性化精神、趣味或情感、经历而创作的牡丹诗

尽管北宋时期牡丹审美活动被赋予很多政治化色彩,成为朝廷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催生了一大批以歌功颂德、歌咏太平为主旨的牡丹诗词,但是,作为一种与士大夫文人乃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观赏性花卉,当它脱离那种特定语境之后,仍然能以其独有的魅力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进而触发个性化的情绪、心理或感触。这类牡丹

诗词,显然继承和丰富了中晚唐士大夫文人的牡丹诗创作传统。

(一)体现北宋士大夫文人博物之趣的牡丹诗

《论语·阳货》尝论《诗》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对《诗》之用的这一诠释,事实上包含了《诗》在客观上具有广泛记录和展现外部世界、自然万物的作用。另外,相传从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博物类、本草类著作的《山海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小学经典《尔雅》等,汇聚了大量早期博物学知识,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谱系中的博物学传统。魏晋南北朝以迄初盛唐,涌现出许多类书及专门的博物学著作。不过,作为古代知识阶层主体的士大夫文人,对于博物学的兴趣,大致在唐宋时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前此,博物学知识的探索多少带有垄断性色彩,在《汉书·艺文志》中多列术数、方技及子部农家、杂家等,在《隋书·经籍志》及此后的四部图书中多属子、史部,可以说是学有专门,一般的士大夫文人未必有专门的关注。唐宋以后,随着知识传播方式的进步、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进展,士大夫文人在博物学探索方面的兴趣和能力逐渐拓展,至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俨然形成热衷于探索博物学知识的潮流和风尚。宋祁、欧阳修、苏轼、范成大等士大夫文人中的佼佼者,亲自编纂、撰述或记录各地、各类方物,《益部方物略记》《洛阳牡丹记》《东坡志林》《桂海虞衡志》等,则是其中的荦荦大者。

北宋士大夫文人的这种博物学兴趣与风尚,在牡丹审美玩赏与题咏中,也有鲜明体现。比如,自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撰成之后,许多诗人在留意和观赏各地各种牡丹品种的同时,用诗歌的形式对之进行记录、描写和咏赞。比如王禹偁《朱红牡丹》《和张校书吴县厅前冬日双开牡丹歌依韵》、夏竦《宣赐翠芳亭双头并蒂牡丹仍令赋诗》《延福宫双头牡丹》《奉和御制千叶黄牡丹》《五月同州奏牡丹一枝开三花》、宋庠《玉宸殿并三枝牡丹歌》《安福殿千叶双头并枝白牡丹歌》《魏花千叶》《姚黄》《清辉殿双头牡丹》《瑶津亭同窠双头牡丹》、宋祁《千叶牡丹》、梅尧臣《白牡丹》《紫牡丹》、欧阳修《白牡丹》、张方平《两浙张兵部秋日牡丹诗次韵》、范纯仁《和孙曼叔北禅牡丹一蒂三花》、韦骧《州宅牡丹盛开蒙剪栏中奇品见赠仍属短歌于席上》《小雪后牡丹号朝天红者开于县宅西圃》、苏轼《游太平寺净土院观牡丹,中有

淡黄一朵奇特,为作小诗》《三萼牡丹》、苏辙《谢任亮教授送千叶牡丹》《次迟韵千叶牡丹二首》《同迟赋千叶牡丹》、孔平仲《双头牡丹》、黄庭坚《谢王舍人剪送状元红》《王立之以小诗送并蒂牡丹戏答二首》等,用诗歌的形式广纪花品,分享观赏到奇特珍贵的牡丹品种时的喜悦,在体现诗人们体物兴趣的同时,对于我们了解北宋牡丹栽培水平及盛况颇有裨益。这类作品的大量出现,无疑体现了北宋诗人对于博物学的热衷,他们以诗的形式穷形尽相地描写牡丹之美的创作兴趣,是牡丹品种日益繁盛之后自然而然出现的新的创作倾向。

(二)体现北宋士大夫文人闲逸情致的牡丹诗

北宋士大夫文人比较注重日常生活中的闲逸情致,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牡丹赏玩活动及相应的牡丹题咏之中。比如宋初李昉和李至唱和创作过两组四首牡丹诗(李昉《独赏牡丹固而成咏》,李至《奉和独赏牡丹》;李昉《牡丹盛开对之感叹寄秘阁侍郎》,李至《奉和牡丹盛开之什》)。李昉原唱主要抒写闲暇时节赏玩牡丹时的闲情逸趣,以及时光催人老的衰迟之感,但主要流露出来的还是流连光景的雍容闲雅;李至和作虽然对李昉原唱中的衰迟之感有所回应,但总体格调仍与李昉诗近似。通过这两唱两和,我们不难感受到北宋前期士大夫文人赏玩牡丹并形诸题咏的一般情状。

这种悠游闲逸的吟赏风调和对于牡丹的特别期待,在张齐贤《答西京留守惠花酒》中有形象的表达:

有酒无花头慵举,有花无酒眼倦开。好是西园无事日,洛阳花酒一齐来。(《全宋诗》第504页)

张齐贤(942-1014)也是北宋前期名臣,在宋太宗、宋真宗朝曾前后为相二十余年。张齐贤以其清望之资,公事闲暇,赏花品酒,自然是雍容闲雅。故当其西京留守牡丹花季送来洛阳花、洛阳酒,自然是极为惬意之事。这首《答西京留守惠花酒》,正是此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即宋仁宗朝的名相韩琦。韩琦对于牡丹有着特别的感情,凡所营建之宫室园亭,必种牡丹以供日常闲暇之玩赏。比如《阅古堂八咏》之《牡丹》云:“极塞将何奉燕娱,牡丹池馆一株无。谁人会我栽培意,欲见吴宫小阵图。”《新植花开》云:“去岁栽花遍小园,只忧芳艳不禁寒。年来醉赏春风里,无限边人见牡丹。”这两首诗是其知

定州时期所作,写的是在定州阅古堂种植和观赏牡丹之事。诗中所谓“极塞将何奉燕娱”“无限边人见牡丹”等,即是说虽然定州地处北方边境,但他仍然有意在此栽植牡丹,作为治边之暇燕娱之需,亦可使边境军民得见盛于中州的牡丹。又如其知相州时,在州署后营建昼锦堂,亦于堂中栽植牡丹以供吟赏(《乙卯昼锦堂同赏牡丹》诗云:“我是至和亲植者,雨中相见似潸然”),其《昼锦堂赏新牡丹》《昼锦堂同常牡丹》《昼锦堂再赏牡丹》《乙卯昼锦堂同堂牡丹》等诗,即为此而作。此外,他的《安正堂观牡丹》《北第洛花新开》《北第同赏牡丹》《狎鸥亭赏牡丹》,以及《赏北禅牡丹》《赏西禅牡丹》《中书东厅十咏》之咏“牡丹”等,都是他公事之暇在公私园池、官署、禅院等各处赏玩牡丹时所作。

除此之外,王禹偁、晏殊、宋庠、宋祁、司马光、邵雍、欧阳修、强至、苏轼等北宋名臣,也都喜欢在公事闲暇吟赏牡丹。比如苏轼有《雨中庆赏牡丹》云:“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燃。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著酥煎。”(《全宋诗》第9152页)《吉祥寺赏牡丹》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全宋诗》第9152页)《坐上赋戴花得天字》云:“清明初过酒阑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岂关吾辈事,老狂聊作坐中先。醉吟不耐欹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结习渐消留不住,却须还取散花天。”(《全宋诗》第9251页)等,往往花酒并提,颇寓闲逸情致。这些士大夫文人们之吟赏牡丹,虽不排除时有感慨,但确实有不少诗是藉题咏牡丹以呈现或抒发其闲逸情致。

(三)藉玩赏及题咏牡丹以观物明理的牡丹诗

北宋诗人长于观物以明理,牡丹作为玩赏观照的对象,也时常能激发士大夫文人对于人生、世事等的哲理思索。这些情境及思索形诸歌咏,使不少牡丹诗带有比较明显的阐理意味,从而富于理趣。比如韩琦《感花》云:“雕堂瞰宝栏,有花病不妍。谁知穷山颠,牡丹一尺圆。宝栏锄溉足,穷山风日煎。彼此不得地,天道胡为然。两适岂易得,兹恨无穷年。”曾巩《种牡丹》云:“经冬种牡丹,明年待花看。春条始秀出,蠹已病其芽。柯枯叶亦落,重寻但空槎。朱栏犹照耀,所待已泥沙。本不固其根,境翰谩咨嗟。”薛汝砺《和执中游山四首·谷隐寺》云:“谷隐多牡丹,一花百千叶。一根出一切,一切一根摄。爱君看花处,立悟恒沙劫。其谁知此意,只有花间蝶。”所有这些诗都在观赏牡丹的同时,借牡丹以阐发人

生、世事的道理。释道潜(即参寥子)的《僧首然师院北轩观牡丹》有“清静老禅根道妙,即此幻色谈真空”,也是藉牡丹以阐理的作品。

以牡丹为观照对象,集中阐发对于世事、人生乃至天地本原之感悟思考者,自然非邵雍莫属。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移居洛阳,与当时退处洛阳的司马光、富弼、王拱辰、吕公著等过从甚密,王拱辰、富弼和司马光等人后来出资为其在洛阳天官寺西天津桥南置办园宅。邵雍从此在洛阳自耕自种、自给自足,取园宅名为“安乐窝”,自称“安乐先生”。在邵雍的《伊川击壤集》中,我们看到大量专门题咏牡丹或咏及牡丹的诗篇。

邵雍对于牡丹的题咏,有的也带有明显流连光景的性质,比如《南园赏花》二首云:

三月初三花正开,闲同亲旧上春如。寻常
不醉此时醉,更醉犹能举大杯。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见
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全宋诗》第
4526页)

虽然第二首末二句“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略微带有一点人生哲理的意味,但总体来看,这两首诗主要抒写的仍是花开时节对酒赏花流连光景的兴趣和情致。

有的牡丹诗一方面表达爱花惜花的心情和流连光景的兴致,另一方面则藉此阐发对于人生、世事的感悟,如《惜芳菲》云:

细算人间千万事,皆输花底共开颜。芳菲
大率一春内,烂漫都无十日间。亦恐忧愁为
龃齬,更防风雨作艰难。莫教此后成遗恨,把火尊
前尚可攀。(《全宋诗》第4483页)

《对花饮》云:

人言物外有烟霞,物外烟霞岂足夸。若用
校量为乐事,但无忧挠是仙家。百年光景留难
住,十日芳菲去莫遮。对酒无花非负酒,对花无
酒是亏花。(《全宋诗》第4516页)

这两首诗的结句都似曾相识,前一首与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之一结句“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相近,后一首与张齐贤《答西京留守惠花酒》开头两句“有酒无花头慵举,有花无酒眼倦开”接近,表达的都是爱花惜花、流连光景的心理情致,但触发诗思的却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基于人生体验的“人间千万事”皆“光景难住”,与百草行花之芳菲易去,故前一首的第二联“芳菲大率一春

内,烂漫都无十日间”和后一首的第三联“百年光景留难住,十日芳菲去莫遮”,显得尤其警策而发人深思。这种看似浅显、人人能知的道理,在邵雍题咏牡丹的诗篇中多次出现,如《春阴》云:“花能五七日,月止十二圆”;《嘱花吟》云:“花无十日盛,人有百年期”;《落花长吟》云:“花能十日尽,酒未百壶空”。邵雍之所以喋喋不休地吟叹,大约是因为一般世俗之人虽知此事实而不悟其中之理。

这一层意思,在《落花长吟》中进一步推扩为对于历史兴衰的观照与体悟:

以酒战花秣,花秣酒更浓。花能十日尽,酒
未百壶空。尚喜装衣袂,犹怜坠酒钟。多情唯粉
蝶,薄倖是游蜂。减却墙头艳,添为径畔红。飘
零深院宇,点缀静帘栊。又恐随流水,仍忧嫁远
风。水流犹委曲,风远便西东。狼籍残春后,离
披晚照中。亭台虽有主,轩骑断无踪。剑去拥妃
子,兵来围石崇。马嵬方恋恋,金谷正匆匆。曹
植辞休切,襄王梦已终。谬称寻洛浦,浪说数巫
峰。燕诉冤还在,莺传信莫通。苔钱如可买,柳
线自能缝。怅望尤真宰,凄凉殢化工。放教成烂
漫,不使略从容。命扫心争忍,言收计遂穷。异
香销骨髓,绝色死英雄。任谗回天力,饶矜盖世
功。奈何时既往,到了事难重。开谢形相戾,兴
衰理一同。天机之浅者,未始免忡忡。(《全宋
诗》第4506页)

这首诗带有咏史的意味,由花之盛衰联想到诸多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而思及花之开谢与历史、时势之兴衰,事虽殊而理实同。

邵雍作为一位理学家,对于外物的观照,最终往往会归结到观物悟道、阐理明道上来。在他的许多题咏牡丹的诗篇中,他会直接以观物悟道者的姿态出现。

赏花全易识花难,善识花人独倚栏。雨露
功中观造化,神仙品里定容颜。寻常止可言时
尚,奇绝方名出世间。赋分也须知不浅,算来消
得一生闲。(《独赏牡丹》,《全宋诗》第4526页)

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
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
神,精神人莫造。(《善赏花吟》,《全宋诗》第
4559页)

在这两首诗中,作者以善识善赏之人的姿态出现,直接描述其观物悟道的努力、过程及所悟。所谓“雨露功中观造化”,即是藉赏牡丹以观察、体认宇

宙万物之理;所谓“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是说透过牡丹花,可以观察和体认天地、宇宙、自然之本原与(循环往复)之规律,即所谓“道”。在这里,牡丹是作者观照的对象,是感悟人生、世事的媒介,对于牡丹的题咏,旨趣即在观物悟道和阐理明道。这一旨趣在下面两首诗中也有表达:

造化从来不负人,万般红紫见天真。满城车马空撩乱,未必逢春便得春。(《和张子望洛城观花》,《全宋诗》第4509页)

一般颜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异常。真宰功夫精妙处,非容人意可思量。(《牡丹吟》,《全宋诗》第4667页)

这两首诗阐理意味都比较浓厚。两首诗分别以“万般红紫”四字及“一般颜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异常”两句来咏赞牡丹,看上去是简笔概括或平平除述,细细品味,却意不在此。这两处描摹牡丹的诗句,其实都包含着一个追问:牡丹何以能如此呢?这正是作为理学家的邵雍不同于一般诗人之处。牡丹之“万般红紫”从何而来?洛阳牡丹何以能“一般颜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异常”?这些看似玄妙的追问,答案其实就在诗句之中:前一首诗中的“造化”和后一首诗中的“真宰”即是根源,是本原。“造化”与“真宰”是什么呢?是“天”,是天地,是宇宙,是自然,是一切的本原。正因为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天”主宰着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牡丹才得以“万般红紫见天真”,才得以“香是天香色异常”!因此,《牡丹吟》中“真宰功夫精妙处”究竟何指,乍看上去似乎颇感混沌,细味之实甚了然,即一切本于天,本于自然;因有“天”,有“造化”,有“真宰”,万事万物才得以以其本然之面目呈现出来。这种自然之理,得于天,非得于人,纯任自然,非由缘饰。

当然,在邵雍看来,寻常世俗之人,追欢买笑,何尝思虑及此。故邵氏不无忧虑,同时又高自标榜地写道:“满城车马空撩乱,未必逢春便得春”,“真宰功夫精妙处,非容人意可思量”,即只有像他这样以观物悟道的心态来赏花观物,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

邵雍特别喜欢把赏花和饮酒相对举,认为赏花和饮酒的最好状态是适得其中。比如《年老逢春十三首》其五云:“酒趁嫩醅尝格韵,花承晓露看精神”,其十一云:“花等半开宜速赏,酒闻才熟便先尝”;《对花》云:“人无先酩酊,花莫便离披”;《安乐窝中吟》其七云:“美酒饮教微醉好,好花看到半开时”,其十一云:“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

披”;《二月吟》云:“酒尝新熟后,花赏半开时。只有醺酣趣,殊无烂漫悲”等,都表达了类似意识,即酒趁新熟,花当半开,恰逢其最富“精神”之际。这些诗句其实并非仅指饮酒与赏花,其中实包蕴着人生、世事的道理:尽管天地、宇宙、人世各有其物极必反、始终循环的特点,但人生只一世,作为一个完整生命过程,如何把握和发其辉光,不正应该得其中,当其最富“精神”之际吗?

在理学文化日趋进展的北宋时期,洛阳牡丹这一全社会高度关注和参与的文化现象,之所以成为理学家观物阐理的媒介,一方面,与人们对牡丹相当熟悉,基本上没有陌生感有关。以一种熟悉的事物作为观照、体察和阐理明道的对象,无论对于理学家自身,还是对于广大潜在的被化育的对象,都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因其“人所共知”性,故有方便交流的基础。另一方面,寻常之人对于牡丹赏玩之方式和心态,多属于应景性和即时性,即有所感悟,亦多局于一般性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或个人经历体验,较少上升到“普遍性”或“哲理性”层面,从而一般寻常之人对于蕴含其中的可供体悟与阐发的“普遍性”或“哲理性”蕴涵习焉不察。而理学家(如邵雍)恰恰从中体察、领悟到与人生、世事乃至天地、宇宙相关联相同构的层面,从而使洛阳牡丹成为最好的观物阐理的媒介。

(四)藉题咏牡丹以咏史或批判风俗

1. 藉花咏史

北宋士大夫文人常藉题咏牡丹以咏史。牡丹玩赏风习之兴盛,从初盛唐迄北宋,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期间涌现过相当多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事件,也形成了若干典故或母题。北宋士大夫文人在题咏牡丹之时,常有意无意地贯注了追念、反思历史的意识。比如宋白《宫词》云:“绣骑前驱尽国娃,芳园初看牡丹花。千官狼狽如蜂蝶,回避杨妃七宝车。”李建中《题洛阳观音院牡丹》其二云:“花谱名将第一论,洛中最是此花繁。不当更道木芍药,枝上恐伤妃子魂。”王禹偁《芍药花开忆牡丹绝句》云:“风雨无情落牡丹,翻阶红药满朱栏。明皇幸蜀杨妃死,纵有嫔嫱不喜看。”张扩《次韵谢李簿送白牡丹》云:“繁玉花头取次妍,鞞红从此不论钱。如何未入明皇梦,已醉高吟李谪仙。”都咏及唐玄宗、杨贵妃及李白等玩赏牡丹事;宋祁《牡丹》云:“上国中园买地栽,试知韩令是雄猜。香根斫尽成何事,不识骚人托讽才。”咏及韩翃斫去牡丹之事;梅尧臣《洛阳牡

丹》云:“古来多贵色,歿去定何归。清魄不应散,艳花还所依。红栖金谷妓,黄值洛川妃。朱紫亦皆附,可言人世稀。”更是将洛阳石崇金谷妓、曹植洛神赋等附入牡丹事典。除此之外,李之仪《次韵牡丹四绝》《延寿寺见红药小魏扬州号为醉西施》等,也都带有咏史意味。

在众多藉牡丹以咏史的作品中,徐积《姚黄》、李新《打剥牡丹》较有新意。

黄河南畔伊川北,姚家宅是真花窟。古来多少豪奢儿,埋却千莺万莺骨。中央精粹得之多,西方秀气来相和。天与明光常借日,水宫暗脉正通河。春风如酒半酣时,谁教谷雨报花期。司马坂前娇半启,洛阳城内人俱知。姚家门巷车马填,墙头墙下人参肩。花上红酣都蔽日,花傍翠幕恰如烟。玉面儿来争供帐,锦袍郎去斗抛钱。无人不说姚家好,费却春工亦不少。日长风暖绿梢低,坐上金仙困将倒。鞠尘饼剂和香檀,何以贮之承露盘。烂锦脱来嫌太艳,鲜衣染就欲骖鸾。君看此花肌肉丰,一尺余高千万重。妆面深藏青布障,宝冠斜堕碧霞丛。步摇好称钗凤凰,玉环犀佩珠明珰。帝女何缘心好道,阿娇安用金为房。绀窠累栖舒雁雏,沉烟喷出狻猊炉。一种养成余意态,千花瘦尽春肌肤。峨峨一器欹且倾,覆杯难辨钟与觥。染以绞绀求正色,叩之玉挺希宫声。魏家红共千家碧,迭霸花中耸高格。如今俯首甘下风,九十种中为第一。此花莫似武昭仪,出得宫来不画眉。情貌欲为狐媚态,衣裳却是比丘尼。杨妃本是倾国身,脱却红袄号太真。河水欲濡头上髻,马嵬犹看旧时裙。物色一定犹可疑,人心多变宜难知。容易莫评真与欺,貌或如是心或非。君不见老庄有深意,万物之中最防伪。(徐积《姚黄》,《全宋诗》第7563页)

大芽如茧肥,小芽瘦如锥。我今取去无厚薄,不欲气本多支离。绿尖堕地那复数,存者屹立珊瑚枝。姚黄魏紫各王后,肯许闾阎相追随。姬周祧庙曾祖祢,主父强汉疏宗支。昔人立朝恶党盛,败群杂莠何可知。一母宜男竟衰弱,岂有如许宁馨儿。吾惧生蛇为龙祸,又畏百工无一师。故今披剥信老手,如与造化俱无私。明年春归乃翁出,空庭还闭绝代姿。风雨大是遭白眼,酒炙谁复来齐眉。衡门一锁略安分,幽谷待赏几无时。寄根王谢自得地,燕子归来汝莫疑。

(李新《打剥牡丹》,《全宋诗》第14171页)

徐积(1028-1103),北宋中后期著名学者、诗人。这首《姚黄》有序云:“紫霄漫翁李道源,见约分吟姚黄。余畏其才,不敢惜笔,不得已而后塞命。因为之序曰:天下牡丹九十余种,而姚黄居第一,其名虽千叶,而实不可数,或累计万余余英,不然不足高一尺也。花肉既重,其梢下屈,如一器欹侧之状。此亦花之巨美而精杰者乎,是宜见于诗而不可泯然使寂寂也。”可见这是一首分题唱和之作。在这首诗中,徐积首先对姚黄这一牡丹珍品、花中之王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赞誉,对人们追捧、纵赏姚黄的热烈情境进行了具体描绘。作者一方面有感于唐宋以来洛阳牡丹审美玩赏之风日盛,一方面又联想到在牡丹玩赏风习形成演进过程中,曾有一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参与其中,因而触发了作者对于数百年牡丹风习及唐宋朝政兴衰史的感慨与反思。因此,在诗的后半段,从“此花莫似武昭仪”起,作者将“狐媚偏能惑主”的武则天、倾国倾城的杨贵妃与姚黄作比,牵入武后、杨妃这两个对唐代历史直接发生重大影响的女子,从而指斥人心之诈伪难知。这其中包含着批判红颜祸水、玄宗遭惑以至安史乱起、两京倾覆的历史教训,虽然在后世看来,这些反思略显陈腐,但从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角度来看,也并非全无意义。诗的最后两句“君不见老庄有深意,万物之中最防伪”,批判的矛头既指向姚黄(隐然有视姚黄为花中之妖的意思),又指向人心之诈伪,尤其是武则天、杨贵妃之类容色绝丽却又媚惑人主者。

李新也是北宋后期知名诗人,他的这首《打剥牡丹》与一般牡丹诗稍有不同。此诗没有沿续重点题咏牡丹,或借咏牡丹以反思、批判包括玄宗、杨妃荒淫误国在内的“咏史”套路,而是将牡丹栽培过程中的一道工序——打剥牡丹(即将牡丹上多余的枝干去掉,使花可以开得更好)作为表现的侧重点,将其与古人为强干弱枝以使政权更加稳固,以及为稳固政权铲除朋党奸邪而采取的措施相比拟,从而带有借咏牡丹以表达特定政治见解的意味,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别有见地。这首诗的写作或许是有感于北宋立国之策略以及北宋中后期日益激烈的朝廷党争。

2. 风俗批判

与白居易等人讽刺批判“家家以为俗,人人迷不悟”“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中唐时期过于侈靡的牡丹玩赏风俗相类似,也有一些北

宋士大夫文人对于牡丹玩赏之风尚持讽刺、批评态度。欧阳修、丘濬、赵鼎臣、苏过等人的几首牡丹诗，以诗论世，富于讽刺批判意味。比如欧阳修《洛阳牡丹图》云：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洛人惊夸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赀。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擅价各一时。当时绝品可数者，魏红窈窕姚黄妃。寿安细叶开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传闻千叶昔未有，只从左紫名初驰。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最好潜溪绯。今花虽新我未识，未信与旧谁妍媸。当时所见已云绝，岂有更好此可疑。古称天下无正色，但恐世好随时移。鞞红鹤翎岂不美，敛色如避新来姬。何况远说苏与贺，有类异世夸嫖施。造化无情宜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伪，天欲斗巧穷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岂特近岁尤浇漓。争新斗丽若不已，更后百载知何为。（《全宋诗》第3599页）

欧阳修是最早全面关注并记录洛阳牡丹及相关历史文化和风俗习尚的著名文人，他的《洛阳牡丹记》在他在世时已成为人们所共同关注的经典文献。这首《洛阳牡丹图》作于晚年。诗的前半部分追忆了青年时代关注并撰写《洛阳牡丹记》的经历，以及当时洛阳牡丹品种及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对于洛阳牡丹的进一步关注和追捧，牡丹身价倍增，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培植牡丹名品的情。于是，“四十年间花百变”，令这位《洛阳牡丹记》的作者在感叹之余，多所反思，尤其是对近世以来争炫斗奇、纵赏牡丹的浇漓之风深致不满，表达“近百岁后知何为”的忧虑。又比如下面三首诗：

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孙欲种无余地，颜巷安贫欠买钱。晓槛竞开香世界，夜阑谁结醉因缘。须知村落桑耘处，田叟饥耕妇不眠。（丘濬《仪真太守召看牡丹》，《全宋诗》第2324页）

老觉欢娱少，愁惊岁月频。能消几日醉，又过一年春。陌上枝枝好，钗头种种新。买归持博笑，贡自可怜人。（赵鼎臣《买花诗》，《全宋诗》第14891页）

草木无情解悦人，徒因见少得名新。剪裁罗绮空争似，研合丹青太逼真。尤物端能耗地

力，痴儿竟欲费精神。愿回春色归南亩，变作秋成玉粒匀。（苏过《次韵伯元咏牡丹二首》其二，《全宋诗》第15494页）

他们面对牡丹，所观察到的是社会的不平等（“王孙欲种无余地，颜巷安贫欠买钱”），所想到的是生活在最底层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须知村落桑耘处，田叟饥耕妇不眠”；“买归持博笑，贡自可怜人”），所担忧的是“尤物端能耗地力”，所期望的则是“愿回春色归南亩，变作秋成玉粒匀”。这种批判精神和悯农情怀在我国古代是极为可贵的，李师中在洛阳、苏轼在扬州均曾有罢万花会之举，这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实践^③。

唐宋时期，随着人们对于牡丹玩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洛阳等地涌现出一批技艺高超的园艺工，他们能使“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④，使“芍药牡丹变态百种，一丛数品花，一花数品色”^⑤。对于园艺工们的高超技艺，有的人表示赞赏，如朱长文《次韵公权子通唱酬诗四首》其四《牡丹》云：“奇姿须赖接花工”（《全宋诗》第9798页）；黄庭坚《和师厚接花》云：“妙手从心得，接花如有神。”（《全宋诗》第11467页）但也有人对此违反自然规律的技艺进行批判，如梅尧臣《依韵和接花》云：“唯是圃人巧，非关造化偏。折条违物理，迁艳得花权。美女嫁寒冱，丑株生极妍。世间多妄合，吾不谓之然。”（《全宋诗》第3046页）游酢《接花》云：“色红可使紫，单叶可使千。花小可使大，子小可使繁。天赋有定质，我力能使迁。自矜接花手，可夸造化权。众闻悉惊诧，为我屡叹吁。用智固巧矣，天时可易欤。我欲春采菊，我欲冬赏桃。汝不能栽接，汝巧亦徒劳。雨露草必生，霜雪松不死。有本性必生，亦时雨与之。所遭有变易，是亦时所为。时乎不可违，何物可违时。”（《全宋诗》第12908页）梅、游氏二诗对于园艺工作的接花技艺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他们认为这种接花技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自然规律。这些批评和反思，虽针对牡丹而发，但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人生体悟，值得作更深层次的解读。

（五）藉题咏牡丹以抒发北宋士大夫文人的生感慨

与中晚唐文人牡丹诗一样，北宋牡丹诗词中亦多有藉题咏牡丹以抒发人生感慨的作品。这些诗词或抒发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昔盛今衰的人生感慨，或抒发去国离乡、羁旅贬谪等个体感伤。

先看梅尧臣和欧阳修的两首牡丹诗。梅尧臣和欧阳修都曾在洛阳任职,有过同赏洛阳牡丹的经历,多年以后,两人重返朝廷,得观禁中鞞红牡丹,因而有感而发,唱和创作了下面这两首牡丹诗:

与公司是洛阳客,今日论年皆作翁。一见此花知有感,衰颜不似旧时红。(梅尧臣《禁中鞞红牡丹》,《全宋诗》第3303页)

盛游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谯号醉翁。白首归来玉堂署,君王殿后见鞞红。(欧阳修《禁中见鞞红牡丹》,《全宋诗》第3705页)

这两首诗追忆当年同官洛阳纵赏牡丹之豪,感慨而今一起回朝,出入禁中的荣宠与悲凉。所荣者为归朝任职,得以出入禁中;所伤者为岁月迁流,年华老去,日趋衰迈,盛年不再。

这种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昔盛今衰的人生感触,在梅、欧同时代及稍后其他人的牡丹诗词中频频闪现。比如梅尧臣另有《牡丹》诗云:“粉英不忿付狂蝶,白发强插成悲歌。”《和王待制清凉院观牡丹赋诗》云:“华发我何感,洛阳年少时。”欧阳修《洛阳牡丹图》云:“但应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答西京王尚书寄牡丹》云:“年少曾为洛阳客,眼明重见魏家红。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为白发翁。”《送张屯田归洛歌》云:“昔年洛浦见花落,曾作悲歌歌花落。……一来京国两伤春,憔悴穷愁九陌尘。”文彦博《近以洛花寄献斋阁蒙赐诗五绝褒借今辄成五篇以答来贶》其五云:“纵使当时曾手植,经今十年亦凋衰。”邵雍《上巳观花思友人》云:“上巳观花花意浓,今年正与昔年同。当时同赏知何处,把酒犹难对远风。”《洛阳春吟》其四云:“光阴不肯略从容,九十日春还又空。多少落花无著莫,半随流水半随风。”张舜民《牡丹》云:“去年岐路遇春残,满院笙歌赏牡丹。今岁杜陵千万朵,却垂衰泪向栏干。”邹浩《观牡丹》云:“去年寒食已为客,今年寒食未还家。春前莫负一杯酒,山后聊观三朵花。”这些诗篇或诗句,大多由观赏、题咏牡丹而抒发时序迁流、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忧伤与感慨。宋释智圆《牡丹》云:“谁向风前悟零落,百年荣盛事非长”,堪称对这种忧伤与感慨的最好概括。

对贬谪生涯的怨叹与感伤,是北宋士大夫文人心理活动的另一重要侧面。当诗人们去国离京,在羁旅贬谪途中乍见牡丹之时,往往将这种触动心弦的深切感受付诸题咏,从而使我们能通过一首首牡丹诗,窥见诗人们的心灵悸动。先看王禹偁的两首

牡丹诗:

偶学豪家种牡丹,数枝擎露出朱栏。晚来低面开檀口,似笑穷愁病长官。(《长洲种牡丹》,《全宋诗》第805页)

数枝香带雨霏霏,雨裹携来叩竹扉。拟戴却休成怅望,御园曾插满头归。(《山僧雨中送牡丹》,《全宋诗》第722页)

王禹偁(954-1001)为北宋初期知名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因直言敢谏,屡遭贬黜,尝作《三黜赋》。后贬滁州,移扬州,晚再贬黄州。《长洲种牡丹》一首,是王禹偁任长洲知县时所作,诗中颇寓穷愁之叹。案,王禹偁雍熙元年(984)秋以大理评事知苏州长洲县,雍熙三年(986)尝撰《长洲县令厅记》云:“长洲之名,见《吴都赋》。贞观中,分吴且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县志》缺焉。钱氏享国几一百稔,专建属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载,汉南王归于我国家,始设官以理焉。袁仁鑑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污渚,其俗轻浮。地无柔桑,野无宿麦,饪鱼饭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储蓄。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骄,贫窶者欺而惰。田赋且重,民力甚虚;租调失期,流亡继踵。”^⑥根据这段描述,王禹偁乃宋代由朝廷正式任命的第二任长洲知县。彼时的长洲甚蔽甚贫,殊非佳所。了解这些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这首《长洲种牡丹》结句“似笑穷愁病长官”所包含的穷愁之叹了。《山僧雨中送牡丹》一首,亦贬官外任时所作,前两句记山僧冒雨送牡丹之事,后二句掉转笔头,追忆当年任朝官时期陪侍人君在御园游赏牡丹之事。如前所述,北宋前期经常举行赏花钓鱼宴,两制三馆皆参与,皇帝常以洛阳所贡牡丹及后苑牡丹分赐诸臣以示荣宠。其《锡宴清明日》云:“宴罢回来日欲斜,平康坊里那人家。几多红袖迎门笑,争乞钗头利市花”,所记正是其尝陪侍皇帝参与此类活动的经历。显然,王禹偁的这两首牡丹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栽植或玩赏牡丹,而是在特定情境下有感而作,藉题咏牡丹以抒发贬谪远宦、离京去国的升沉荣辱之感。

吕夷简和范仲淹也有两首带有唱和性质的牡丹诗抒发贬谪远宦、离京去国的升沉荣辱之感。

异香秾艳压群葩,何事栽培近海涯。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五侯家。(吕夷简《西溪看牡丹》,《全宋诗》第1623页)

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

看如故人。(范仲淹《西溪见牡丹》,《全宋诗》第1881页)

吕夷简和范仲淹俱为北宋名臣,他们曾先后被贬至海陵(今泰州)西溪盐场任职。前者在此地任职期间曾种过牡丹,并留下了一首诗《西溪看牡丹》,后者天禧间来此地任职,恰逢牡丹盛开,因而写下了《西溪见牡丹》^⑦。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回京任职的向往。如前诗以质询的口吻问牡丹“何事栽培近海涯”,对牡丹生此僻远之地有所憾恨(“开向东风应有恨”),意谓牡丹不当生长在此处,而应该“移入五侯家”;后者虽然语调比较乐观,认为在这里居然也能见到牡丹,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他所念及的却是“上林色”,流露出对于回京任职的向往。在这两首诗中,触发作者京国之思的正是生长在这僻远小镇上的牡丹。

除此之外,蔡襄《李阁使新种洛花》二首,张耒《到陈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盘,皆绝品也。是日风雨大寒,明日作此诗呈希古》《同李十二醉饮王氏牡丹园二首》《秋移宛丘牡丹植圭窠斋前作二绝示秬秸和》、晁说之《题鄞州牡丹》《牡丹》、洪炎《次韵许子大李丞相宅牡丹芍药诗》、许景衡《吕子光惠牡丹》、邹浩《对牡丹》等,所表达的也是类似的人生感慨。

在这类作品中,宋祁《僧园牡丹》、范仲淹《和葛闾寺丞接花歌》感慨尤深。

朽壤真非托,奇葩惜见捐。根深惟自庇,香酷索谁怜。晚蕊仍晞日,斜柯但倚烟。有人同寂寞,无地与回旋。不预甘棠爱,羞将恶木连。数奇飞将恨,形槁屈生贤。已失南梅早,仍忧北枳迁。荫云今让棘,生淤此饶莲。钿毂排朝露,雕栏怅夜天。馐金会见斫,无事苦憔悴。(宋祁《僧园牡丹》,《全宋诗》第2606页)

宋祁的这首《僧园牡丹》别有感慨。此诗有序云:“予暮春行乐僧舍,涉其中圃,见牡丹数十本,华浅叶臞,杂处丛荟,浸灌阙焉,封殖颓焉。芒夫堯竖,蹈践侵侮。嗟夫,托非其地,俾妍成媿,虽拱壁夜光,不能抗按剑之患,况斯者乎!作诗以伤之。”作者偶然行乐于僧舍,因中圃牡丹之蔽颓,感叹所“托非其地”而致“俾妍成媿”,从而联想到人生际遇之无常,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贤人失志、才士凋丧。这首诗虽然未必是宋祁自身写照,却揭示了士大夫文人命运不偶的境况,引人怅叹。

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众中

忽闻语声好,知是北来京洛人。我试问云何至是,欲语决澜堕双泪。斯须收泪始能言,生自东都富贵地。家有城南锦绣园,少年止以花为事。黄金用尽无他能,却作琼林园中吏。年年中使先春来,晓宣口敕修花台。奇芬异卉百余品,求新换旧争栽培。犹恐君王厌颜色,群芳只似寻常开。幸有神仙接花术,更向都城求绝匹。梁王苑里索妍姿,石氏园中搜淑质。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腻壤弥缝密。回得东皇造化工,五色敷华异平日。一朝宠爱归牡丹,千花相笑妖娆难。窃药常娥新换骨,婵娟不似人间看。太平天子春游好,金明柳色宠黄道。道南楼殿五云高,钧天捧上蓬莱岛。四边桃李不胜春,何况花王对玉宸。国色精明动韶景,天香旖旎飘芳尘。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献寿罗星辰。兑悦临轩逾数刻,花吏此时方得色。白银红锦满牙床,拜赐帐前生羽翼。惟观风景不忧身,一心岁岁供春职。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诉。窜来江外知几年,骨肉无音雁空度。北人情况异南人,潇洒溪山苦无趣。子规啼处血为花,黄梅熟时雨如雾。多愁多恨信伤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减,复有乡心难具陈。我闻此语聊悒悒,近曾侍从班中立。朝违日下暮天涯,不学尔曹向隅泣。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我无一事逮古人,滴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恹恹吊形影。接花之技尔则奇,江乡卑湿何能施。吾皇又诏还淳朴,组绣文章皆弃遗。上林将议赐民畋,似昔繁华徒尔为。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范仲淹《和葛闾寺丞接花歌》,《全宋诗》第1868页)

这是一首唱和诗,和葛闾寺丞《接花歌》。葛闾《接花歌》,《全宋诗》未见收录,估计已佚。范仲淹这首七言歌行,篇幅较长,在创作运思和思想内容方面与白居易《琵琶行》颇为相似。诗中的那位“江城老卒”,相当于浔阳江畔因年老色衰而“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诗中的“我”则相当于遭受贬黜冷落浔阳的江州司马白居易。不过,由于描写对象有别,范仲淹本人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境界也与白居易略异,因此,在具体描写及情志抒发方面,并没有受到《琵琶行》之牢笼。这首诗用了较大篇幅让曾经的

“接花”高手,如今的“江城老卒”追述当年以接花技艺游食于京洛的得意生涯,特别是描写帝王后妃追赏牡丹、“接花”吏因高超的栽培技艺博得帝王欢心一段,可以说是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可惜“中途得罪”而被“窜来江外”,苦不堪言,以至于“骨肉无音”,“苦无趣”,“目昏耳重精力减,复有乡心难具陈”。通过着力刻画这位江城老卒的悲苦怨抑,范仲淹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他的同情,也由他的经历和遭遇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情感共鸣。但是,范仲淹毕竟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进取型的士大夫,他没有像白居易那样与这位接花高手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而是尽管“朝违日下暮天涯”,却绝对“不学尔曹向隅泣”。接下来通过与西汉贾谊、唐代刘幽求的流放贬谪生涯相对比,不仅不怨尤自己的遭受贬谪,反而颇“庆幸”自己“谪官却得神仙境”。这里当然有自我安慰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范仲淹虽遭贬谪,而始终心怀正大之心,始终相信当天子之圣明,因而认为自己一定能重回京师(“一旦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这无疑体现出作者的乐观精神和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尽管这首诗仍然流露出了强烈的去国怀京之感和贬谪之慨,但由于范仲淹精神境界不同于被贬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所以,诗中的积极精神冲淡了贬谪主题,从精神、情感基调的层面实现了对《琵琶行》的超越。

综上所述,基于颂圣心理而创作的牡丹诗和基于士大夫文人精神、趣味或个性化的情感、经历而创作的牡丹诗构成北宋牡丹诗的两大主要类型,前一类突出显示了北宋时期牡丹与政治联姻的牡丹审美文化,后一类则主要体现了北宋士大夫文人多思善感,比较热衷于观物兴趣或体物悟道的时代精神或文化品格。后者在继承中晚唐牡丹诗的基础

上,情感和思致的层次更加丰富,表明文人化的牡丹审美更加深入和细密。

注释:

- ①详参[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四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65-1466页。
-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四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66页。
- ③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繁卿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万花本洛阳故事,亦必为民害也。”(参《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二编第二册第881页,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亦有记载);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九:“洛中旧有万花之会,岁率为之,民以为扰。李师中到官,罢之,众颇称焉。”(参《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八编第一册,第525页。)
- ④唐柳宗元《龙城录》:洛人宋单父,字仲儒。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51页)
- ⑤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九:宣和初,京师大兴园圃蜀道进一接花人曰刘幻,言其术与常人异。徽宗召赴御苑,居数月,中使诣园检校,则花木枝干,十已截去七八。惊诘之,刘所为也。呼而诘责,将加杖。笑曰:“官无忧。今十一月矣,少须正月,奇花当盛开。苟不然,甘当极典。”中使入奏。上曰:“远方伎艺必有过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刘白中使,请观花,则已半开,枝萼晶莹,品色迥绝。酴醾一本五色,芍药牡丹变态百种,一丛数品花,一花数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莲重台繁香芬郁光景繁绚,不可胜述。事闻,诏用上元节张灯花下,召戚里宗王连夕宴赏,叹其人术夺造化。厚赐而遣之。(《笔记小说大观》第八编第五册,第2675页)
- ⑥[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参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9-60页。
- ⑦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海陵西溪盐场,初文靖公(吕夷简)尝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诗刻石。后范文正公亦尝临蒞,复题一绝(诗略)。后人以二公诗笔,故题咏极多。而花亦为人贵重,护以朱栏,不忍采折,岁久茂盛,枝覆数丈,每花开数百朵,为海滨之奇观。(参《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八编第二册,第1014页)

[责任编辑 杨捷]

Praise Cultural Mentality and Spirit of Scholar-Bureaucrats: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of Peony Poems in North Song Dynasty

LU Cheng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North Song Dynasty, there had some new features on the peony appreciation. In this case, there had new trends in the field of peony poems. First, a lot of officials expressed the praise for the emperors. Second, some scholar-bureaucrats expressed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mselves.

Key words: peony poems in North Song Dynasty; praise cultural mentality; spirit of scholar-bureaucrats; cultural considerations